

卓南生《东亚新闻事业论》出版中文增订本

本地书苑

卓南生新作《东亚新闻事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日出版,该书是作者在日文版《东亚新闻事业论——从官版汉字新闻、战时傀儡政权的新闻统制到现在》基础上大幅度增加面向中国读者篇章的中文增订本,也是作者代表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

书市走一回

张曦娜/报道
陈斌勤/摄影

本地学者郭振羽教授近日出版学术随笔集《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八方文化出版),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辗转游走在本地几所大学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了他多年来对本地文化现象与针对本地华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从社会学者到创系主任

郭振羽教授1973年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在连续签了三次三年聘约后,从此长居新加坡,至今已经47年,为“老移民”中的“建国一代”。

午后造访郭教授坐落于西部的公寓,听他在回忆中谈起,他在本地学术界,如何在机缘巧合下,在不同大学担负起不同职责。最初,郭振羽与太太罗伊非携带一对年幼子女,自美国来到新加坡,在当年的新大武吉知马校区的社会系任教,由此开始他在新加坡的学术生涯,之后又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

1996年郭振羽正式离开任教23年的国大。在国大任教时,郭教授于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1992年,他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到云南园创办传播学院,并于1992至2003年间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2003年,他又在南大第二任校长徐冠林邀请下,筹划成立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并在2003年至2005年间为创院(署理)院长。

2008年,郭振羽教授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1990年至2010年间,他还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创刊主编。

研究生笔下“小贩”写成“小饭”

说到刚问世的《杏坛听雨》,郭教授说,之所以出版这本学术随笔,缘自几年前《怡和世纪》主编林清如邀他写稿,设立的专栏名就叫“杏坛听雨”,既是“杏坛”又是“听雨”,既是“雨声”,也是“羽声”。郭教授说:“《怡和世纪》的专栏写了两年,让我自那时开始,按时间顺序,一段段的,有系统地记录下将近半世纪的学术旅程。”

《杏坛听雨》分为五辑,分别为辑一的“杏坛听雨”,辑二的“文化新加坡”,辑三的“华语和方言”,辑四的“儒家伦理运动”及辑五的“学思随笔”。

在“杏坛听雨”这一辑里,郭教授从初来乍到细说从头,记录学术生涯的点滴回忆,从1973年到新加坡大学报到,写到当前在新跃社科大学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本地大学的发展史。

郭振羽初抵新加坡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家庭社会学,二是语言社会学,并在1979年和简丽中合编出版《当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语言社会学同好阿芬德拉合编《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也因为有了这两本著作,郭振羽说:“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基础,自认对新加坡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可以自称是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了。”

有趣的是,在《初识新加坡》这一章里,郭振羽回忆起当

《东亚新闻事业论》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近现代华文新闻史的探源与发现”和第二部分“日本的新闻学与大众传媒”,作者通过对原件和准原件的追溯与考究,紧扣着中日两国近代新闻(纸)的共同起点及其后发展的不同轨迹与现象,审视19世纪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报人在东亚的新闻实践,及其“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编辑方针,给中日近代新闻事业打下的烙印与提供的“范式”。

本书第三部分将视野投向作为近代华文报刊发源地和欧美前殖民地的东南亚,勾勒并探究东南亚华文报业独特的发展历程与难题。第四部分“与青年学者分享研究的苦与乐”,则展现了作者长期以来对新闻学理及新闻史研究核心问题与方法论的沉思与辨析。

卓南生曾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现为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顾问。(黄涓/整理)



《东亚新闻事业论》是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

郭振羽教授说,游走在双语双文化之间,或许可以努力做个文化的摆渡人。



郭振羽随笔集《杏坛听雨》

近半世纪治学授业的回顾与思考

郭振羽新书记录他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他多年来对本地语言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



《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由八方文化出版。

年社会系每周三下午“学术研讨会”中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旧事:一件是吃惊之事,事关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贩中心)的研究报告。书中做了如此描述:“她在开场白之后,很慎重很努力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我初次接触体会(新大)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惊。”

另一次是有趣之事,事关一位人类学者在研讨室讨论“进化论”,却见窗外几只猕猴探头探脑似在探班,一时传为“佳话”,郭振羽形容,那是“社会系口述历史常提到的一个‘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其实研讨室的第11号楼紧邻植物园常有猕猴来访,“只是那次探访碰上进化论讨论,自由自在的猴子,对比关在窗内的人类,难免令人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努力做个文化摆渡人

细读本书第一辑的“杏坛听雨”,会读到当年本地学术界的一些语言与文化现象,而作为当年学术界的外来者与旁观者,郭振羽在《做个文化摆渡人》一文中描述他初到新加坡时,新加坡的制度和文化还是英制殖民式的,每天上午,还习惯地要到食堂喝上午茶和下午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振羽写道:“和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同事原来华语还不错,却很少用

华语交谈,就算是讲华语,也要压低声音,以免‘骚扰’别人。我那时才理解到,原来在新大讲华语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是‘不正确的’。”

郭振羽也回忆起他后来接触南大纯华语的环境,校园里路名布告标语大多是华文,上课用华语,食堂里一片华语(兼方言)喧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分析道:“从语言社会和交流互动的分析中,我深深感觉到这两个社群之间的鸿沟,很大程度地制约了新加坡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依郭振羽教授的分析,新大与南大二者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语言本身,更在于彼此间的错误认知,是“傲慢”和“偏见”的错位。“英校生对华校生的态度,基本上是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认为后者封建落后,既土气又保守,跟不上时代。华校生看英校生则是充满偏见,觉得后者受‘西方歪风’影响,行为不检,思想肤浅,只顾个人享乐,缺乏社会关怀,因而有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郭振羽也坦承他个人来往于两个校园、两个群体之间,“看得出来这种以偏概全的傲慢与偏见,不能反映真相。只是这两个校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两个社群),好像是两个孤岛,少有交流,彼此间缺乏互动、缺乏了解。两边的弥合,还有待有心人的努力,以及岁月的洗礼。”

至于他自己,他说:“游走在双语双文化之间,努力学习,自觉可以也应该‘做点事’,即便没有能力在两个孤岛之间建桥,或许可以努力做个文化的摆渡人吧。”

关注新加坡语言发展

作为社会学学者,研究重点包括语言社会学,郭振羽教授多年来关注新加坡社会发展,也持续关注语言状况。在《杏坛听雨》第二辑“文化新加坡”和第三辑“华语和方言”中,收录了多篇对于新加坡社会、语言课题、华人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思考文章。

访谈中,郭教授回想起一件有关语言的旧事:1979年4月在

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根据统计数字,本地能够听懂多种语言和方言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他并在结论中指出,在有利的环境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没想到论文发表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代方言的“讲华语运动”。

郭教授说:“记得我当天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论文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9月初李光耀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对当下华语前景乐观

对于当下新加坡华语的前景,郭振羽教授是乐观的,在《来日风光犹可期——新加坡华语再生的契机》一文,他指出,今日新加坡社会和1980年代大有不同,这30年间,“国际局势和新加坡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不能再以当年华社面对的困境,来分析今日的局面。在今日的新加坡,华语华文根基未绝,生机犹在,正可走出谷底,争取再生的契机。”

郭振羽让数据说话,从1980年到2010年新加坡的四次人口普查,他整理了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以来,30年间华族家庭的统计资料,其中包括一项“主要家庭用语”的资料,从中看出几个主要语言的起落兴衰:从1980、1990、2000、2010年的统计可知,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跌落到2010年的19.2%。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则由1980年的10.2%增长到2010年的32.6%。让人意外的是,一般人并不看好的华语家庭,从1980年的13.1%增加到2010年的47%,“涨幅”竟达34.6%,远超过英语的22.4%。

郭振羽也明白,许多人看到这些统计资料,总要半信半疑,“因为这和一般人的‘常识’理解相差甚远”。他说道:“新加坡一般家庭都是多种语言并用,

调查人员登记的是家庭成员使用‘最多’的语言。因此,以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也会用到英语或方言;同样的,以英语为用语的家庭,也常可以听到华语和方言。就是和子女讲‘蹩脚英语’的父母,家庭主要用语未必是英语。”

郭教授说:“不论如何解读,由当前统计数字看来,虽不敢说情势一片大好,实在无法得出华语大江东去的结论。”

另外,郭教授也指出,近年

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这3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的540万。这30年间,增加了3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或是短期居留的外来人口。这其中,又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中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都发挥积极的贡献。”